

徐光啟朝鮮傳教計劃始末考

文英傑

上海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

一、引言

被譽為「中國聖教三大石柱」的徐光啟（1562-1633），留下了許多流傳甚廣的歷史軼事，徐光啟曾試圖親赴朝鮮傳教，即是其中的一個傳奇故事。徐光啟朝鮮傳教的計劃，不僅對這位偉人形象的全方位建構有着重要的意義，而且對韓國天主教的開教始源研究，以及對耶穌會在遠東早期活動的研究也有重大的意義。所以，西方、中國還有韓國，甚至日本的天主教研究者，也對徐光啟的朝鮮傳教計劃給予了關注。¹但看似廣為人知的這傳奇，深入觀其細微之處時，筆者卻發現故事結構不完整、各自撰述有不同、援引史料不準確、事實關係需究明等等問題。也就是說，似乎人人都可以講「徐光啟曾有過朝鮮傳教計劃」，但或許僅

1. 西方學者的研究有 Daniello Bartoli, *Dell' 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u: l'Asia* (Rome: Nella Stamperia del Varese, 1663); Aloy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 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South Bend: Note Dame University, 1962); Ruiz de Medina, *Origines de la Iglesia Catolica Coreana desde 1566 hasta 1784 segun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86); 中國學者的研究有羅光,《徐光啟傳》(台北:傳記文學,1982);初曉波,《從華夷到萬國的先聲——徐光啟對外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韓國學者的研究如崔爽右,《韓國天主教的歷史》(首爾:韓國教會史研究所,1982);崔爽右著,趙玄範、徐貞華譯,《在朝鮮最初大牧區的設定及天主教的起源》(首爾:韓國教會史研究所,2012);日本學者的研究有:浦川和三郎,《朝鮮殉教史》(大阪:全國書房,1944);姜在彥,《西洋之朝鮮:その異文化格の歴史》(東京:文藝春秋,1994)。

此一句話而已，若要講述其具體來龍去脈，頓感難圓其說。因此，本文通過梳理現有研究成果，並考據相關史料，試將把徐光啟朝鮮傳教計劃的前後始末展現出來，謹此為徐光啟研究添磚加瓦。

特別要指出的是，筆者至今未能發現徐光啟本人對「朝鮮傳教」計劃留下一點文字記錄。²目前在各多的徐光啟相關中文資料當中，關於徐光啟朝鮮傳教計劃較為廣傳的參考資料，則是法國耶穌會士費賴之（Louis Aloys Pfister, 1833-1891）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中的一段記錄。³費賴之稱：「仇教之事未息」之時，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 1582-1649）來到北京徐光啟處；那時徐光啟主張派大臣赴朝鮮征兵，朝廷許可；徐光啟準備帶同畢方濟去朝鮮傳教，並準備攜帶利瑪竇的著作；即將出發時，有大臣反對說，派徐光啟出國會影響朝政，建議派另外人選；結果徐光啟朝鮮傳教計劃就失敗。⁴續費賴之之後，榮振華（Joseph Dehergne, 1903-1990）又補充了一句費賴之未提到的信息：「他〔畢方濟〕於同一時代籌劃了一次前往朝鮮的旅行。」⁵另外同

2. 如王重民，《徐光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梁家勉，《徐光啟年譜》（上海：上海古籍，1981）；梁家勉著，李天剛增補，《增補徐光啟年譜》（上海：上海古籍，2011）；陳偉平、李春勇，《徐光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以及中國天主教人物史研究的權威著作，方豪的《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上冊也沒有對徐光啟「朝鮮傳教」計劃的記述。
3. 費賴之，〈畢方濟〉，載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兩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上冊，頁143；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第一冊，頁164。
4. 在此處，費賴之標注為“Relation de 1621, in Histoire de ce qui s'est passé, p. 251; Bartoli, Cina, p. 697; Relation de 1621, op.cit., pp.206 seq.”，見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第一冊，頁164。中國學者周萍萍也曾提及徐光啟朝鮮傳教計劃，雖然周萍萍沒有標注援引出處，但從字面上看，與費賴之的這段記述同出一轍。參見周萍萍，〈十八世紀天主教開教朝鮮半島之曲折〉，載《廣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頁135。
5. 榮振華，〈畢方濟〉，載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兩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下冊，頁592。榮振華在此標注了史料出處：「〔日本一中

一時期來華工作的葡萄牙耶穌會士伏若望 (Joao Froes, 1590-1638)，也提到徐光啟朝鮮傳教計劃，但沒有標明具體的根據來源。⁶

而後來研究者的記述，大多與費賴之接近。韓國學者崔奭右也主張徐光啟是策劃者，並補充說徐光啟「向耶穌會請求派幾名隨同的耶穌會士」，而對畢方濟卻隻字未提。⁷日本學者浦川和三郎雖沒有標注援引出處，但與費賴之幾乎相同，只是多了一句「徐光啟勸誘畢方濟，計劃讓他與其同行」的記述。⁸同樣，美國學者鄧恩 (George H. Dunne) 也沒有標注出處，但全文與費賴之基本相同。⁹還有台灣學者羅光明確地講述說，印制的書籍就是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的《天主實義》。¹⁰羅光對此並未標注，而中國學者顧衛民在其研究中，卻直接援引羅光的這段論述。¹¹

另有一個需要關注的是中國學者初曉波的論述。初曉波也參考了費賴之，但又提供一個前面研究者沒有提及過的線索，那就是，所謂的〈畢方濟給總部的報告〉。初曉波注明，該畢方濟的報告內容源自日籍韓人學者姜在彥的《西洋與朝鮮：異文化格鬥的歷史》。¹²筆者追溯到姜在彥的研究則發現，姜在彥又是援引梅迪納 (Ruiz de Medina, 1927-2000) 的《遙遠的高麗——十六世紀韓國開教和日本

國資料集》，載《耶穌會羅馬檔案》，卷十六，頁 49-52。」

6. 伏若望著，董少新譯，〈徐保祿進士行實 (1634)〉，載《澳門歷史研究》6 (2007)，頁 157-158。
7. 崔奭右，《韓國天主教的歷史》，頁 11。崔奭右標注史料出處為：“Relazione delle cose più notevoli scritta negli anni 1619, 1620, 1621 della Cina, (Roma: 1624), p.72.”
8. 浦川和三郎，《朝鮮殉教史》，頁 23-24。
9.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p. 153；也見鄧恩著，余三樂、石蓉譯，《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上海：上海古籍，2003），頁 137。
10. 羅光，《徐光啟傳》（台北：傳記文學，1982），頁 112。
11. 顧衛民，〈早期中國與朝鮮天主教的若干聯繫〉，載《韓國研究論叢》1998 年第 00 期，頁 174-175。
12. 初曉波，《從華夷到萬國的先聲》，頁 87。

耶穌會》。¹³梅迪納的這部力作中，¹⁴專門有一章節為「在中國進行的計劃：龍華民、畢方濟和徐光啟」，記述當時發生的朝鮮傳教一事，¹⁵而梅迪納的這段研究，基本上就依據該〈畢方濟報告〉。

二、〈畢方濟報告〉和〈傅泛際報告〉

所謂的〈畢方濟報告〉，即是於一六二〇年四月二十日畢方濟在天津寫給當時耶穌會總會長維泰勒希（Muzio Vitelleschi）的信函。¹⁶在此，筆者根據梅迪納書的附錄，¹⁷摘譯有關朝鮮計劃的部分。

寫信人：畢方濟；收信人：總會長維泰勒希；

日期：天津，一六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在這個國家發生對我們耶穌會的逼迫以後，……中國傳教區院長龍華民神父，決定讓我離開南方，遣派我到北方，目的是為了讓我遇到機會時進入朝鮮，或去陝西開展新

13. 姜在彥，《西洋之朝鮮》，頁 43-44。

14. 梅迪納神父，出生於西班牙馬德里，自一九五四年起在日本活動的耶穌會士，一九八一年調到羅馬耶穌會歷史研究所，負責日本天主教研究部。Juan G. Ruiz de Medina, *Origenes de la Iglesia Catolica Coreana desde 1566 hasta 1784 segun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86)。該書被譯成多種語言，日文版為 J. G. 兒イズデメデイナ，《遙かなる高麗——十六世紀韓國開教之日本イエズス會》（東京：近藤，1988）；韓文版為梅迪納著，樸哲譯，《韓國天主教會傳來的起源（1566-1784）》（首爾：西江大學校出版部，1989）；英文版為 *The Catholic Church in Korea: Its Origins, 1566-1784* (trans. John Bridges; Roma: Istituto Storico S.I., 1991)。

15. Medina, *Origenes de la Iglesia Catolica Coreana desde 1566 hasta 1784 segun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pp. 120-122.

16. 維泰勒希，Muzio Vitelleschi（或 Mutio、Mutius，1563-1645），意大利耶穌會士，一五八三年加入耶穌會，一六一五年當選為耶穌會第六任總會長。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上冊，頁 378；費賴之譯為「威特勒斯奇」，見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頁 66。

17. Sambiasi, *Addressed to: Muzio Vitelleschi, General of the Order*, in Medina, *Origenes de la Iglesia Catolica Coreana desde 1566 hasta 1784 segun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pp. 274-275。該書信收藏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ARSI]），書目為「日本，161 I 49」，原文是意大利文。

的傳教事業。……我坐船歷經四個月的旅程，抵達了北京城稱作天津衛的地方。博士聞悉，就吩咐與他一親戚來迎接我，……後來應博士的邀請，我住進博士的宅院，寄居在博士住宅內的書房裏，另有一位修士和兩位信徒陪同我。

……博士知道我肩負朝鮮傳教的任務，就利用目前與滿清的戰事，試圖以組建軍隊的理由去說服皇帝，讓皇帝派遣自己到朝鮮王國，借此機會秘密帶同我一同前去，在那裏傳播我們至聖的信仰。而那是向中國朝貢的國家，所以，如果博士能獲得如此重要的任命，就能得到朝鮮國王在內的許多皈依者。

為了這一計劃，博士數呈上疏，極力陳述各種大膽的策略。……他的眾多策略之一，就是，建議皇帝派大臣赴朝鮮，訓練朝鮮軍隊，確保聯合抗滿的實施。官吏呈上皇帝的所有上疏，都要通報於朝廷各部，這是中國的慣例，所以，皇城內外所有官吏都看到了博士的嚴謹而合理的邏輯和主張，並異口同聲地稱皇帝能接納徐光啟的建議就好了。……結果，所有的人都選擇了博士為這次冒險行使的人選，一致向皇帝懇請批准博士的請願。皇帝同意，任命博士為特使，並賦予在朝鮮的極大的特權。於是，博士準備立即出發（我也正要與他同去，因為我的上級已經給我許可）。

正當這時，一位閣老（相當於一位我們國家的顧問議員）出來阻擾，向皇帝提出非常雄辯的上疏稱，時下把博士這樣的重要人物派往國外，是不明智的舉措，建議皇帝應該任命他，負責皇宮和王國的防禦和保護事宜。因那位閣老的建議，皇帝改變主意，改變原來的任命，賦予博士在國內訓練軍隊的新任務，同時把博士的職位晉升五個等級。就這樣，剎那之間所有計劃成了泡影。

……

於天津衛，北京府的一個城鎮，距離皇宮兩天的路程

一六二〇年四月，復活節第二天，畢方濟

通過〈畢方濟報告〉，可以較為完整地呈現出徐光啟朝鮮傳教計劃的始末，但筆者發現，還存在一份重要的資料，它可以補充這段歷史的還原。那就是葡萄牙耶穌會士傅泛際（Francisco Furtadom, 1589-1653）留下來的的一份資料——〈傅泛際報告〉。¹⁸

梅迪納在其書中附錄〈畢方濟報告〉之後，緊接着也收錄了〈傅泛際報告〉。¹⁹筆者感到意外的是，梅迪納在探討徐光啟朝鮮傳教計劃時，不知何故，卻沒有引用該資料中相關的內容。²⁰在此，筆者根據梅迪納書中的附錄，摘譯〈傅泛際報告〉中有關朝鮮計劃的部分。

題目：〈一六一九年，仕宦徐光啟〉；寫信人：傅泛際；

收信人：無

日期：澳門，一六二〇年十一月一日

……他再次向皇帝上疏請願派遣使臣赴朝鮮，向朝鮮的支援表示謝意，弔念戰死的朝鮮將士，訓練朝鮮軍隊的戰術策略。並且表示，只要皇帝允許，情願自己擔當這一使命。保祿的計劃是，借此機會帶幾名傳教士過去，也許能夠讓朝鮮國王皈依福音，因為他會恭敬地迎接這中國皇帝授權的特使。

18. 傅泛際，又稱傅泛濟，其生平參見費賴之，〈傅泛際〉，載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頁 156-158；榮振華，〈傅泛濟〉，載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上冊，頁 251。

19. Furtado, "The Mandarin Hsü Paulo, 1619", in Medina, *Origenes de la Iglesia Catolica Coreana desde 1566 hasta 1784 segun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pp. 275-278。該資料收藏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書目為「日本，114 222 v」，原文是葡萄牙文。

20. Medina, *Origenes de la Iglesia Catolica Coreana desde 1566 hasta 1784 segun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pp. 120-122.

……皇帝任命保祿博士為朝鮮特使。……得到任命之後，保祿立即到教會感謝基督，並派人去請駐北京院長神父〔龍華民〕，是要和他還有居住在自己家中的畢方濟咨詢，為了完成這一朝鮮傳教的使命，要做哪些準備。神父到了之後，……他們決定，要由一名傳教士和一名信徒與特使一起出發，並告訴他們為了更好地說明天主教的奧秘，要印刷許多有用的書籍。這樣，保祿就做好了去朝鮮傳達皇帝旨意和天主福音的準備。

但是，看來改宗這個國家的時候還沒有到來，這計劃成為泡影了。因為，這時一位大臣向皇帝提出請願書諫言，如此危難時期，把保祿博士這樣精明、博識、美德的重要人物，調離朝廷是不明智的舉措，可以讓另外朝廷裏不怎麼重要的人去擔當這一使命。皇帝認為這一請願方案更為合理，讓保祿留在官中，授予他更為榮譽、更為體面的三個職位。皇帝的決定得到了朝廷內深知保祿重要性的所有官員的歡迎。只有保祿和神父們才因失去一次進入朝鮮的絕好的機會，而感到痛惜。……

根據〈畢方濟報告〉和〈傅泛際報告〉，可以綜合出如下大致的來龍去脈：

（一）這次朝鮮傳教計劃，是緣起龍華民（Nicolò Longobardo, 1559-1654）的戰略意圖，是他派遣畢方濟去中國北方時下達的指令之一；（二）徐光啟先知道畢方濟朝鮮傳教任務，後有自薦出使朝鮮的上疏；（三）徐光啟借以出使朝鮮機會，秘密實行朝鮮傳教的計劃，是與畢方濟一同策劃的，並且得到龍華民的許可；（四）徐光啟的上疏得到朝廷內外的認可，也得到皇帝的任命。當朝鮮傳教準備一切就緒之時，但因一位閣老的反對意見，皇帝反悔而最終失敗。

但通過進一步的考察，也能對以下幾個關鍵細節提出質問：

(一) 關於事情伊始的具體時間。〈畢方濟報告〉和〈傅泛際報告〉的落款為一六二〇年，崔奭右、浦川和三郎也記述一六二〇年，而鄧恩、姜在彥、梅迪納則記述發生在一六一九年，費賴之則稱「仇教之事未息」之時。「仇教之事」顯然是指沈淮發起的南京教案，但南京教案發生於萬歷四十四年（1616），歷時數年，直至一六二一年沈淮被罷免才算南京教案了結。如此講來，徐光啟策劃的具體時間是何時？

(二) 關於計劃實施的具體內容。徐光啟「朝鮮傳教」計劃是深藏在親自出使朝鮮上疏裏面的，但對出使朝鮮的緣由也各持一說。如，費賴之、浦川和三郎稱是為赴「朝鮮征兵」，傅泛際、崔奭右稱是為「向朝鮮國王表示吊念，同時為了招募新兵」，鄧恩稱是為「勸說朝鮮當局與滿族人抗爭」，畢方濟卻稱是為「組建並訓練朝鮮軍隊」。究竟，徐光啟請願親自出使朝鮮的理由和目的何在？

(三) 關於計劃失敗的具體原因。畢方濟、傅泛際稱，徐光啟此次計劃是因「一位閣老出來阻擾」而受挫，該閣老反對的理由就是在當時混亂的時局之下，「博士這樣的重要人物派往國外是不明智的舉措」。但實際上導致徐光啟計劃失敗的原因，難道就僅此一個原因嗎？

為了解開上述幾個疑點，考察徐光啟的上疏內容是必須的。因為，徐光啟的朝鮮傳教計劃是暗藏在上疏之中，所以，該上疏的名分或可行性，即是「朝鮮傳教」實施的保障。也就是說，徐光啟出使朝鮮的策略實行與否，決定着朝鮮傳教計劃的成功與否。

三、徐光啟「朝鮮監護疏」

其實，徐光啟所提出的上疏，應該稱之為「朝鮮監護疏」。徐光啟提出「朝鮮監護疏」的起因，並非「朝鮮敗於滿清軍」，²¹應該說是「薩爾滸戰役」中明一朝聯軍的慘敗。²²在這種國家的危急關頭，徐光啟分析當前的緊迫時局，闡明朝鮮所佔據的特殊位置，進而提出行之有效的抗滿策略。

薩爾滸戰敗之後的萬歷四十七年(1619)三月二十日，徐光啟提交了第一份上疏，即〈敷陳末議以殄兇酋疏〉。²³四月初五日提交第二份上疏，即〈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疏〉，²⁴其中提到「向朝鮮國王表示弔念」之事。²⁵六月二十八日提交第三份上疏〈遼左阡危已甚疏〉，²⁶其中最後「亟遣使臣監護朝鮮以聯外勢」這一部分，則是本文要考察的關鍵文本——「朝鮮監護疏」。²⁷

「朝鮮監護疏」，一開始就出現非常重要的關鍵詞，那就是「監護」二字。徐光啟首先分析當前明一滿一朝三鼎格局之後，強烈地主張，為了形成明朝與朝鮮的內外呼應格局，必須派遣使臣監護朝鮮。「監護」的必要性則在於：朝鮮已「師徒喪敗，魄悸魂搖」，要不監護朝鮮，在

21. 崔奭右，〈在朝鮮最初大牧區的設定及天主教的起源〉，頁 33-34。

22. 關於「薩爾滸戰役」，可參見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載顧廷龍編，《續修四庫全書·四三七》史部·雜史類（上海：上海古籍，2002）；李治亭主編，《東北通史》（鄭州：中州古籍，2003），頁 417-421。

23. 徐光啟，《徐光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上冊，頁 97-101。

24. 同上，頁 101-106。

25. 同上，頁 102。又見 Medina, *Origenes de la Iglesia Catolica Coreana desde 1566 hasta 1784 segun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p. 275；崔奭右，〈韓國天主教的歷史〉，頁 11。

26. 徐光啟，〈遼左阡危已甚疏〉，載徐光啟，《徐光啟集》，上冊，頁 106-117；《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光海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壬子；李弘胄，〈梨川相公使行日記〉，林基重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第十冊，頁 110-115。以上文獻所記錄的〈遼左阡危已甚疏〉均相同，本文以下主要援引《徐光啟集》上冊，特此說明。

27. 徐光啟，〈遼左阡危已甚疏〉，載《徐光啟集》，上冊，頁 114-115。

滿族的威脅和誘惑之下，甚至會「鮮奴之交已合」。接着，徐光啟根據歷史案例、朝鮮當前現狀和軍事戰略利害關係，進一步強調「朝鮮監護」的必要性，以及如何「監護」。徐光啟闡述「監護」朝鮮的目的即是，時時闡明朝鮮為「華夏君臣，天經地義」，「加以日逐警醒，使念皇上復國洪恩，無忘報答」，並且「再與點破奴賊之巧圖惡並」。另一方面，「察彼心神無二」，「若被誘脅，情形變動，便當責以大義，一面密切奏聞，以便措置防範」。根據上述的分析，徐光啟則建議：因為這次「監護」之重任，應該由大臣來擔當，並且根據此次任務的針對性，文官勝於武將。同時徐光啟積極地自薦自己是合適人選，並且要求人事權，自選定隨從人員，特別是為了「相機應用」而帶同「巧工教師」。這與畢方濟一起策劃的朝鮮傳教計劃相吻合，而且是極其周密、智慧又可行的策略。在結尾處，徐光啟強調出使「朝鮮監護」任務的艱巨性和複雜性，還特別強調「機欲潛深，法應秘密」。²⁸

那麼，徐光啟為甚麼如此強調「朝鮮監護疏」的保密性呢？上文已揭示過，該計劃不管在邏輯上還是戰略上都非常周密，正如畢方濟所言，足以贏得朝廷上下的認可。所以，基於外交、軍事策略上，對內無需保密；同時對滿清來說也不是機密的內容，因為當時已經就是明朝於朝鮮組成聯合軍並肩作戰的狀況。要麼，是因為內藏朝鮮傳教的目的嗎？也可以否定，因為「朝鮮監護疏」字面上毫無破綻，而且朝鮮傳教計劃只是徐光啟、龍華民、畢方濟等極少數關鍵人士所籌劃的。

究竟，徐光啟要對外保密最關鍵的原因何在？應該在朝鮮朝對「監護」的反應上。對於朝鮮朝來講，明朝雖是

28. 同上。

朝鮮的「事大國」但非「宗主國」。所以，徐光啟很明白，如「監護」這種涉及到朝鮮主權的話題，是極其敏感的。歷史證明徐光啟的顧慮是正確的，果然在這保密方面出現了問題。

四、李弘胄〈聞見事〉

秘密推行「朝鮮監護」的計劃，被朝鮮燕行使李弘胄發現，²⁹而且導致了最終徹底的流產。關於徐光啟「朝鮮監護」結尾細節，李弘胄提供重要的資料——〈聞見事〉。³⁰

朝鮮光海十一年，也即萬歷四十七年（1619），光海君任命李弘胄為燕行謝恩使兼千秋使。³¹因為是薩爾滸戰敗即後派遣的燕行使，李弘胄擔負的使命非常重大。³²八月初八日，剛抵達燕京的李弘胄，就聽到了徐光啟提出監護朝鮮上疏的傳聞。對於徐光啟這個人物，在朝鮮外交官們也早有耳聞。³³於是，李弘胄東奔西跑，調動所有的公與私的人際關係，終於把徐光啟的上疏抄本弄到手。九月十五日，李弘胄整理這事情的來龍去脈，寫成報告書，派專人火速呈報朝廷。這份報告書以「秘密狀啟」的形式編寫，共有三個部分組成，一是李弘胄記錄在京事態的報告書——〈聞

29. 李弘胄（1562-1638），號梨川，關於李弘胄的生平，可參見金大吉，《梨川李弘胄研究》（首爾：全州李氏宣城君派明山宗中，2010）。在朝鮮時代，判書為正二品官職；領議政、左議政，右議政為議政府（相當於如今國務院）三個政丞（相當於總理），正一品官職。

30. 李弘胄〈聞見事〉，現有兩個出處：一是李弘胄，《梨川相公使行日記》，載金大吉，《梨川李弘胄研究》，頁676-704；二是李弘胄，《梨川相公使行日記》，載林基重編，《燕行錄全集》，第十冊，頁11-125。本文主要援引《梨川李弘胄研究》中收錄的《梨川相公使行日記》。

31.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光海十一年一月初二日丙戌；三月十八日辛丑。

32.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光海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己亥；三月十八日辛丑；四月二十五日戊寅。

33. 任命為李弘胄下一任的燕行使李廷龜，與光海君的一段對話：「王曰：『徐光啟何如人耶？』廷龜曰：『徐光啟，天下名臣也。小臣前於往來時，亦聞其聲華，而今以遠、廣之論，國人稱以識事務之人云矣。』」見《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光海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戊寅。

見事〉，³⁴二是徐光啟「朝鮮監護」上疏抄本；三是李弘胄提交給明朝的〈辯誣復題〉。³⁵

〈聞見事〉記述說，李弘胄聽到徐光啟的上疏經六卿科道的奏請被皇上否決的消息，但因徐光啟的上疏「是系極密，討得無路」，無法確認真相。所以李弘胄付與「重價」，收購了徐光啟幾份上疏的印本。獲悉徐光啟上疏的李弘胄，則「不勝驚愕」，因為他明白「監護」對朝鮮來說是意味着何意。為了守護祖國的主權和利益，李弘胄奮力抗辯，九月初五，拜見兵部侍郎黃嘉善歷陳辯誣，得到「國忠順，萬萬不疑」的答覆。³⁶翌日，又拜見禮部侍郎何宗彥申述辨白，也得到「朝鮮之忠於本朝，三尺童子知之。……諸臣不必懷疑」的答覆。³⁷李弘胄認為，禮部侍郎何宗彥則是掌管明朝國事的名臣、深受敬仰的閣老，又是與太學土方從哲最親密的同僚，既然何侍郎親筆確認「二策皆不行」的國策，那麼，這段「朝鮮監護」風波應該落下帷幕了。³⁸

李弘胄〈聞見事〉對徐光啟「朝鮮監護」計劃被否決的結論，提供生動的資料，而對被否決的具體原因，卻提供不了詳細的描述。因為，李弘胄抵達燕京時，早已有大概的定論。李弘胄在明朝禮部、兵部展開積極辯誣，得到了朝廷明確的否決答覆，但這只是起到了蓋棺定論的作用而已，並非徐光啟「朝鮮監護」計劃被否決的直接原因。那麼，明朝廷否決徐光啟出使監護朝鮮的原因何在，過程如何？

34. 李弘胄，〈梨川相公使行日記〉，頁 104-108。

35. 李弘胄的〈辯誣復題〉全文，收錄於李弘胄，〈梨川相公使行日記〉，頁 99-104。

36. 李弘胄，〈梨川相公使行日記〉，頁 72-73、107。

37. 同上，頁 74-75、107。

38. 同上，頁 104-108。

五、計劃失敗原因

要究明徐光啟「朝鮮監護」計劃原因，那麼，必須要了解徐光啟上疏到最終否決的過程。上文已提到，徐光啟提呈「朝鮮監護」上疏的背景，就是「薩爾滸戰役」的慘敗。薩爾滸兵敗即後，禮部左侍郎何宗彥提議「朝鮮死亡將士，亦當速為周恤，一以獎朝鮮之擁護，一以動北關之效用」。³⁹何宗彥的該提議，立即得到當時明一朝聯軍前線總指揮、兵部左侍郎、遼東經略楊鎬的響應。隨即楊鎬也提呈「優恤朝鮮」的奏請並得到了皇上的允許。⁴⁰讓明一朝聯軍在薩爾滸幾乎全軍覆沒的指揮官，竟然請求「優恤朝鮮」並得到皇上的同意，這又如何可能的？因為楊鎬背後有當時大閣老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等政治後台。⁴¹

當時，兵部尚書黃嘉善也公開支持楊鎬的「優恤朝鮮」主張，稱朝鮮對明朝「世篤忠貞」，⁴²但朝廷裏已經形成另一股針對的意見，那就是懷疑朝鮮的忠心卻要「監護朝鮮」的主張。六月二十二日，楊鎬被撤換，熊廷弼新任兵部右侍郎兼遼東經略。⁴³熊廷弼與徐光啟是故交，並對當時遼東時局的理解是靈犀相通的。六月二十八日徐光啟提呈〈朝鮮監護疏〉的同一天，熊廷弼也提呈〈敕議守禦收復疏〉，表明對朝鮮的懷疑和憂慮，強烈主張「監護朝鮮」方略。⁴⁴

39. 《明實錄·神宗實錄》，萬歷四十七年四月壬戌。何宗彥(?-1624)的生平，參見張廷玉編，〈何宗彥傳〉，載《明史（卷二四〇）》第二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40. 《明實錄·神宗實錄》，萬歷四十七年五月丁亥。

41. 方從哲(?-1628)的生平，參見張廷玉編，〈方從哲傳〉，載《明史（卷一八九）》第十九冊。黃嘉善(1549-1624)，字惟尚，萬歷四年(1576)科舉進士，於一六一〇年授任明朝西北部總督。因在西北部得到卓越的軍事統率能力，升任為兵部尚書，並得到「四世一品」勳章。但後遭到薛鳳翔的彈核，於一六二〇年卸任，甚至都未能收入到張廷玉編撰的《明史》人物傳記。

42. 《明實錄·神宗實錄》，萬歷四十七年六月乙亥。

43. 《明實錄·神宗實錄》，萬歷四十七年六月癸酉。熊廷弼(1569-1625)的生平，參見張廷玉編，〈熊廷弼傳〉，載《明史（卷二五六）》第二十冊。

44. 《明實錄·神宗實錄》，萬歷四十七年六月己卯。

其實，兵敗薩爾滸之後，任命楊鎬為作戰指揮官的方從哲、黃嘉善，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立場非常尷尬。甚至，新任的熊廷弼公開與黃嘉善作難，責備兵部在楊鎬和遼東戰事問題上的過錯；⁴⁵背地裏還顯擺自己，藐視兵部尚書。⁴⁶之所以熊廷弼如此作對，是因為他的背後也有一個強有力的同志，那就是兵部給事中薛鳳翔。關於薛鳳翔這個人物，清代張廷玉編撰的《明史》人物傳記也沒有收錄。但據燕行使李廷龜所言：薛鳳翔脾氣很不好；就是積極彈核方從哲和黃嘉善的主動人物；向來對朝鮮是持懷疑態度的；對「朝鮮監護」問題上與徐光啟意見相同；更重要的是，他與熊廷弼一脈相通，凡是朝鮮事宜都要妨礙。不僅如此，薛鳳翔在朝廷上堪稱強勢人物，他不僅獨斷兵部的事務，連朝廷都要看他臉色。⁴⁷

所以，當時朝廷內對「優恤」還是「監護」的戰略討論，實際上是兩大政治派系尖銳矛盾的角逐。一方是，最大限度地減少薩爾滸戰敗責任，而要守住地位的方從哲—黃嘉善—何宗彥等「朝鮮優恤派」；另一方是，嚴厲地追究薩爾滸戰敗的指揮責任，而要奪取朝廷主動權的薛鳳翔—熊廷弼—徐光啟等「朝鮮監護派」。雙方矛盾很尖銳，但不以血腥的政治風波來解決矛盾，卻以中國特色的方式得以圓融的解決。

七月二十一日，閣老方從哲奏請皇上審議該案件。⁴⁸二十六日，⁴⁹工科給事中祝耀祖上疏稱：徐光啟「不辭險阻」

45. 熊廷弼，〈與本兵黃嘉善書〉，載李紅權編，《熊廷弼集》（北京：學苑，2010），頁1104-1105。

46. 熊廷弼對李廷龜稱：「兵部是我，我是兵部，閩外之事，我當專之。」見李廷龜，〈庚申燕行錄〉，《月沙集》別集卷三，載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1），第六十九冊，頁524。

47. 同上，頁524-527。

48. 《明實錄·神宗實錄》，萬歷四十七年七月壬寅。

自願出使，是難得的膽識和忠貞；但目前危機不在朝鮮，練兵不必到遠處；建議提升徐光啟的職銜，「近地」留用。⁵⁰同日，吏部尚書趙煥等也聯名合奏稱：滿清的目標是要「迫京師」，所以建議授於徐光啟為監察禦史，在京師負責「募兵訓練」。⁵¹也就是說，嚴格按照奏請三步驟，閣老方從哲提議，祝耀祖動議，趙煥再請；更重要的是，避開矛盾震源地兵部，調動吏部、工部等其他部署的官員奏請；盛讚徐光啟自薦出使「朝鮮監護」方略的膽量、智慧、忠貞，雖然與徐光啟的請求是相悖的，但又不失徐光啟的體面，卻晉級安排在北京。可見方從哲該三步棋精密之至，八面玲瓏。深知朝廷內部的難纏派系和殘酷暗鬥的年邁的萬歷皇帝也心照不宣，趁風使舵，下了一手關門棋子。翌日，皇上下旨：「徐光啟曉暢兵事，就着訓練新兵，防禦都城。」⁵²九月九日，又下旨：「左贊善徐光啟晉職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禦史，管理練兵事務。」⁵³正如畢方濟所言，徐光啟官職晉升「五個等級」，⁵⁴因為左贊善為從六品而監察禦史則是正四品。但在此畢方濟講述徐光啟晉升五級的心境，或者傅泛際強調授任的三個職位是那麼地榮耀而體面，⁵⁵也許是對此次策劃精湛並極有實現可能的朝鮮傳教計劃的失敗，感到惋惜而抒發的自己安慰罷了。

49. 需要說明的是，《明實錄》記載的日期為七月二十六日，而《徐光啟年譜》記錄為九月二日，各不相同。但據〈梨川相公出使日記〉記述，李弘胄於八月八日已聽到皇上否決的消息，見李弘胄，〈梨川相公使行日記〉，頁 65；而皇上下旨徐光啟留守京師的日期則為七月二十七日，《明實錄·神宗實錄》，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丁未。所以筆者判斷，七月二十六日的準確可能性更大。

50. 《明實錄·神宗實錄》，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丁未。

51. 同上。

52. 見梁家勉，《增補徐光啟年譜》，頁 225。

53. 《明實錄·神宗實錄》，萬歷四十七年九月戊子；見梁家勉，《增補徐光啟年譜》，頁 225。

54. Sambiasi, *Addressed to: Muzio Vitelleschi, General of the Order*, p. 275.

55. Furtado, "The Mandarin Hsü Paulo, 1619", pp. 275-278.

六、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考據歷史資料、捋順現有研究，整理出徐光啟朝鮮傳教計劃的始末，並加以分析其起因和失敗原因。

一六一九年（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按照龍華民的朝鮮傳教戰略部署，畢方濟被派到北方。在徐光啟處寄居的畢方濟，向徐光啟轉達朝鮮傳教任務，得到徐光啟積極的支持。徐光啟借此「薩爾滸戰敗」以後的危難時局，提出自薦出使「朝鮮監護」的秘密上疏，並準備帶領畢方濟等人前赴朝鮮傳教。但因朝廷內部尖銳的政黨暗鬥，未能得到皇上的允許，卻留任京師負責新兵訓練。再加上秘密泄露於朝鮮燕行使李弘胄，李弘胄憤然辯誣，爭取到明朝最終否決「朝鮮監護」的確認公函。雖然，事後徐光啟晉升五個等級，但歸根結蒂，徐光啟「朝鮮監護」計劃徹底告終了，當然精心策劃而隱藏在其中的「朝鮮傳教」計劃也破滅了。

但徐光啟也沒有表現出繼續的、堅決的出使朝鮮意志，正當李弘胄頻繁活動於朝廷各部積極辯誣時，徐光啟也沒有任何反應。只是在事過九年以後，整理自己〈遼左阡危已甚疏〉時，加按〈自記〉感嘆稱：

四路既敗，奴賊威脅朝鮮，與之通好，傳所謂「從於強令，豈其罪也」。第此語得諸經略疏中，非無征之言，而鮮人辯疏，極力抵諱，且語意與此疏相應。爾時曾未發抄，不知何從泄之。雖然，若果行此，鮮國君臣必相允從，練得鮮兵二萬，可以坐制奴賊，而鮮國亦無他日之禍矣！⁵⁶

56. 徐光啟，《徐光啟集》，上冊，頁116。

也就是說，徐光啟悔憾無比，雖然當時朝鮮極力辯誣，但實際上是與自己上疏中的預測是一樣的，若是當初採納其「朝鮮監護」建議，哪會有後來自己早已預言的朝鮮之禍。更重要的是，徐光啟念念不忘，自己的該秘密上疏，到底是從哪裏泄露的。

徐光啟本人糾結着「泄密」，筆者也無法深究其糾結的深層原因，或許是為「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朝鮮傳教計劃失敗而不甘心。對於這次失敗，畢方濟、傅泛際是感到遺憾，也有人是覺得惋惜，⁵⁷但也有人冷靜地評價。文史學家王重民在其輯校的《徐光啟集》序言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評述，筆者借以代替本文的結束語。

徐光啟對於鄰國的關係也做過一些考慮，如哪方面應該聯擊，哪方面應該警惕，也都是很需要的；但他總是以宗主國自居，並不想以平等的、互利的關係待人，那就很難發揮正確的睦鄰作用。⁵⁸

關鍵詞：徐光啟 畢方濟 朝鮮監護 朝鮮傳教計劃

作者電郵地址：kuzuk6818@hanmail.net

57. 如周萍萍稱，「否則，朝鮮半島開教年代可能要提早一個半世紀。」（〈十八世紀天主教開教朝鮮半島之曲折〉，頁 135。）

58. 王重民，〈序言〉，載徐光啟，《徐光啟集》，上冊，頁 21。

中文書目

- 《明實錄·神宗實錄》 [*The Annals of Ming Dynasty – Shenzongshilu*]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FANG Hao. 3. Volumes. *Zhong guo tian zhu jiao shi ren wu z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8.]
- 王重民。《徐光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WANG Zhongmin. *XU Guangq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 李治亭主編。《東北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LI Zhiting, ed. *Dong bei tong shi*. Zhengzhou: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ress, 2003.]
- 李紅權編。《熊廷弼集》。北京：學苑，2010。[LI Hongquan, ed. *Xiong tingbi ji*. Beijing: Xueyuan Press, 2010.]
- 伏若望。〈徐保祿進士行實（1634）〉。董少新譯。載《澳門歷史研究》6（2007）。頁 153-160。[João Froes. “Algumas Couzas de Edificacao da Vida e Morte do Doutor Paulo (1634)”. Translated by DONG Shaoxin. *Estudo de Historia de Macau*, 6 (2007). pp. 153-160.]
- 初曉波。《從華夷到萬國的先聲：徐光啟對外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CHU Xiaobo. *Cong hua yi dao wan guo de xian sheng: Xu guangqi dui wai guan nian yan ji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 周萍萍。〈十八世紀天主教開教朝鮮半島之曲折〉。載《廣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頁 134-136。[ZHOU Pingping. “Shi bas hi ji tian zhu jiao kai jiao chao xian ban dao zhi qu zhe”. *Guangxi Social Science*, 2003 issue 2. pp.134-136.]
- 徐光啟。《徐光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XU Guangqi. *Xu Guangqi j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84.]
- 陳偉平、李春勇。《徐光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CHEN Weiping & LI Chunyong. *Xu Guangqi ping*

- zhua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梁家勉。《徐光啟年譜》。上海：上海古籍，1981。[LIANG Jiamian. *Xu Guangqi nian p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81.]
- 。《增補徐光啟年譜》。李天剛增補。上海：上海古籍，2011。[LIANG Jiamian. *Zheng bu xu guangqi nian pu*. Supplemented by LI Tianga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11.]
- 張廷玉編。《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ZHANG Tingyu, ed. *Ming s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余三樂、石蓉譯。上海：上海古籍，2003。[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Translated by YU Sanle & SHI Ro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3.]
- 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馮承鈞譯。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Pfister, Louis Aloysius.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Translated by FENG Chengjun. Changsha: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8.]
-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Pfister, Louis Aloysius.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Translated by FENG Chengju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5.]
- 羅光。《徐光啟傳》。台北：傳記文學，1982。[LUO Guang. *Xu guangqi zhuan*. Taipei: Chuanji Wenxue, 1982.]
- 顧廷龍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2002。[GU Tinglong, ed. *Xu xiu si ku quan sh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95.]
- 顧衛民。〈早期中國與朝鮮天主教的若干聯繫〉。載《韓國

研究論叢》1998 年第 00 期。頁 170-185。[GU Weimin. “Zao qi zhong guo yu chao xian tian zhu jiao de ruo gan guan xi”. *Han guo yan jiu lun cong*. 1998 issue 00. pp. 170-185]

外文書目

Dunne, George H.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62.

Ruiz de Medina, Juan G.. *Origines de la Iglesia Catolica Coreana desde 1566 hasta 1784 segun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86. Tanslated by John Bridge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Korea: Its Origins, 1566-1784*. Roma: Istituto Storico S.I., 1991.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The Annals of the Choson Dynasty* — *Kwuanghaekun Yilkee*]

林基重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LIM Kee-jeong. *Yeonhangrok Jaenjep*. Seoul: Dongk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金大吉。《梨川李弘胄研究》。首爾：全州李氏宣城君派明山宗中，2010。[KIM Dae-Kee. *Leechon Lee Hpng-ju Yeonku*. Seoul: Jaenju Leessi Shenseongkunpa Meongshanjoengjong, 2010.]

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六十九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1。[Minjok Munhwua Chujinhwoi. *Hankuk Munjep Chonggan*, Vol. 69. Seoul: Minjok Munhwua Chujinhwoi, 1991.]

崔奭右。《韓國天主教的歷史》。首爾：韓國教會史研究所，1982。[CHOI Sek-woo. *Hankuk Chonjukyo Yeoksha*. Seoul: Hankuk Kyohwoisha Yeonkusho, 1982.]

浦川和三郎。《朝鮮殉教史》。大阪：全國書房，1944。[Urakawa Wasaburo. *Chosen Junkyoshi*. Osaka: Zenkoku Syobo, 1944.]

姜在彦。《西洋之朝鮮：その異文化格の歴史》。東京：文藝春秋，1994。[Kan Zaigean. *Seiyo si Chosen: Sono Yibunkakaku no Rekisi*. Tokyo: Bunkei Syunjiu. 1994.]

A Study of the Korea Missionary Attempt by Xu Guangqi

MUN Yeong-geol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Study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47th year of Wanli (1619), Xu Guangqi attempted a Korea missionary trip. The program was suggested by Nicolò Longobardo, who instructed Francesco Sambiassi to wait for a chance for starting a Korean mission. Sambiassi and Xu Guangqi discussed the mission. To face the defeat of Ming Dynasty in the Battle of Saerhu, Xu Guangqi implored Emperor Wanli for the approval of the Korea superintendence strategy and volunteered to go to Korea with the mission. Outwardly, it was known as “Korea superintendence strategy”, but in fact it was “Korea missionary attempt”. Xu Guangqi’s plan obtained Longobardo’s approval and he decided to go to Korea with Sambiassi with newly printed missionary book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internal political struggle within the court and the Korean Envoy Lee Hong-ju’s strong protest,

“Korea superintendence strategy” was rejected and the hidden
“Korea mission attempt” also failed.

Keywords: Xu Guangqi; Francesco Sambiasi;
Korea Superintendence Strategy;
Korea Missionary Attempt